

外国近代战例选

祁长松 李雄 谭京生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外国近代战例选

祁长松 李雄 谭京生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外国近代战例选

郝长松 李 雄 谭京生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字数: 321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2,900册

*

书号: 5088·8 定价: 2.85元

序 言

在古今中外悠悠历史长河中，人类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不仅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而且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战争经验。这些在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军事的一般规律。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历史经验表明，战争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有规律地变化着的。“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如果从前人的战争经验缺乏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就不可能正确地掌握战争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现在和探讨未来。同样“洋为中用”，如果对外国的战争经验缺乏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就不可能全面地掌握战争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现在和探讨未来。因之，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和外国古代战争的的经验，对于探讨未来战争，是同样重要的。有鉴于此，我愿意将《外国战例选》推荐给读者，目的就是为读者提供一些外国古近代战争资料，供研究参考。

这套《外国战例选》，是三位从事军事工作的青年同志编写的。近几年来，对外国军事历史的研究在我国逐渐多起来了，

各种研究的书籍和资料陆续出版，三位青年同志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他们敢于动手编写这套书，是值得学习的。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同志来做这件事，这对于我国军事学术的发展是有益的。

此书内容比较丰富，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它包括了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战例为止。统观全书，不仅能比较详细地了解某一战役的情况，而且也可以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作战样式进步的军事历史，窥见西方两千多年战争历史的概貌。因此，本书对于帮助从事军事工作和对军事感兴趣的读者，了解外国有关战争历史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战略战术的变化等知识，都是大有裨益的。

当然，由于资料文献的限制和编写经验的不足，书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他们勇于动笔，敢于撰写的精神，是应当提倡，应当支持的。

杨 秀 山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

（杨秀山同志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

目 录

纳斯比会战	(公元1645年)	(1)
纳尔瓦战役	(公元1700年)	(16)
布伦海姆战役	(公元1701年)	(23)
波尔塔会瓦战	(公元1709年)	(35)
罗斯巴赫会战	(公元1756年)	(48)
鲁腾会战	(公元1756年)	(61)
萨拉托加战役	(公元1777年)	(71)
约克敦战役	(公元1781年)	(88)
土伦之战	(公元1793年)	(100)
乌耳姆战役	(公元1805年)	(110)
奥斯特利茨战役	(公元1805年)	(127)
耶纳——奥尔施塔德战役	(公元1806年)	(140)
俄罗斯战役	(公元1812年)	(155)
莱比锡战役	(公元1813年)	(165)
滑铁卢之战	(公元1815年)	(180)
锡诺普海战	(公元1853年)	(193)
塞瓦斯托波尔之战	(公元1854年)	(203)
七天战役	(公元1862年)	(219)

葛底斯堡战役	(公元1863年)	(234)
萨多瓦战役	(公元1866年)	(245)
色当战役	(公元1870年)	(258)
旅顺之战	(公元1904年)	(271)
✓ 马恩河战役	(公元1914年)	(284)
马祖里湖之役	(公元1914年)	(296)
✓ 凡尔登会战	(公元1916年)	(303)
✓ 索姆河大战	(公元1916年)	(313)
日德兰海战	(公元1916年)	(322)
卡波雷托之役	(公元1917年)	(332)
✓ 亚眠战役	(公元1918年)	(342)
✓ 维多利奥——威尼托战役	(公元1918年)	(352)
✓ 华沙战役	(公元1920年)	(362)
德国闪击波兰	(公元1939年)	(378)
克里特岛之战	(公元1941年)	(389)
中途岛海战	(公元1942年)	(401)
斯大林格勒战役	(公元1942年)	(409)
美英军诺曼底登陆战役	(公元1944年)	(423)
柏林战役	(公元1945年)	(437)
原子弹袭击广岛、长崎	(公元1945年)	(446)

纳斯比会战

（公元1645年）

正当著名的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势如鼎沸之际，英国的大地上也蕴酿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第一次国内战争。

纳西比会战，就是发生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0——1660年）初期的第一次内战（1642——1646年）末期，以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为首的英国议会军队与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国王军队于1645年6月14日在诺桑普顿郡的纳斯比进行的一次决战。其结果，英国国王军队被击溃，虽然国王查理一世侥幸逃走，但国王军队伤亡、损失惨重，而议会军队取得了会战的胜利。此役之后，国王军队一蹶不振，已经没有力量再与议会军队进行大规模交战。

英国内战，是指以新兴的资产阶级为首的英国社会广大阶层以武力反对国王查理一世为代表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斗争，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欧洲第一次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十七世纪接近中叶时，英格兰正处于按资本主义方式迅速改革经济的时期，但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旧式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尖锐的斗争。到了四十年代初期，这种根本的冲突导致了革命形势在英格兰迅速的形

成，并进一步被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查理一世的反动政策所激化。

查理一世是前国王詹姆士一世之子，于1625年继承王位。查理一世目光短浅，对国内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一无所知，却顽固地继续坚持其父王的专制主义政策，仅短短的几年工夫，便造成了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彻底决裂。

1625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议会，对国王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强烈要求首先免除权力极大的、国王的宠臣白金汉公爵的职权。英格兰举国上下普遍对白金汉的所做所为感到愤慨，因为其主持的英国对外政策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英国舰队对西班牙的海上远征，并没有能够夺取西班牙“白银舰队”从美洲掠夺的贵重物资，英国对加的斯的袭击被击溃，并蒙受巨大损失；与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的同时，又于1624年与法国开始了交战……等等。但是，查理一世对朝野舆论一概充耳不闻，并竭尽全力对白金汉加以庇护。他先后解散了要求审判白金汉的第一届和第二届（1626年）议会，并公然威胁说：议会必须服从国王的意志，否则，就把英国的议会制度根本取消。查理一世的言行，迫使议会取消了对国王的资助。因此，国王采取了发行强制公债的手段，但是，这种作法又得罪了高级贵族，连他们也拒绝继续给政府以任何投资。

对外政策的失败和财政收入的危机，使查理一世不得不又去求救于议会。第三届议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628年3月17日召开。议员们抨击了政府对外政策的无能，并发表声明，反对国王发行强制公债的办法。为了限制查理一世的专制野心，议会以“权利请愿书”的形式，要求保障臣民的人身、财产和自由的不可侵犯。查理一世迫于财政上的极端困窘，不

得不在6月7日批准了“权利请愿书”，不久，他就宣布议会休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白金汉被一名军官暗杀。他死后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国王宠臣的亡故，对于国王的政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问题的根本不是在于白金汉的存亡与否，而在于查理一世本人，在于他顽固地执行自己制定的一整套反动的政策。

1629年1月，议会再一次召集会议，重新批评了政府的宗教政策。于是，国王于3月2日下令解散议会，并决定，从此以后不用议会而直接统治和管理国家。英格兰历史上长时期无议会的统治时期到来了。

上述各届议会的休会以至被迫解散和政府在外交、经济、宗教方面的政策，以及查理一世此间的所作所为，都激起了议会与国王之间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

国王解散议会后，囊中依然空空如洗，而债务却与日俱增。政府急需大量款项，而又不愿意再去召集议会，遂决定利用国王的特权，单独寻找收入的来源。也正是这种打算，使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看成是对他们财富的威胁，这些人不能够容忍国王如此蛮横地夺取他们的钱囊，决心与国王抗争，从而加速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灭。

1637年，担负处理政治和宗教案件的特别法庭——星室法庭，对编写和出版清教小册子的一些教士、律师作出野蛮的判决，将他们绑在耻辱柱上，当众鞭打，并割去双耳，投入终身监狱。这种暴力，迫使成千上万的清教徒出走海外。仅十年时间，迁往国外的清教徒就有65000余人。

在对清教徒实行残酷恐怖政策的同时，英国国教却与天主教日益接近，这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当中引起极大的不满，因

为这一部分人的土地和财富大多是依靠对天主教修道院的没收而得到的。

在此期间，由于欧洲大陆的战争频繁，引起了对英国商品需求量的增加，因而对外贸易和工业方面有了一些活跃气氛。这种有利可图的市场行情，暂时减弱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激怒。在这些年月里，专制制度仿佛获得了某种胜利，因为只要有了补充财库的永久性财源，就足以使国王长期地摆脱议会的束缚。

1637年，大主教劳德企图在苏格兰推行英国国教。苏格兰虽然从1603年起就与英格兰共同拥戴一个王朝，但在内政和宗教事务方面仍然保留有完全的自主权，因此，推行英国国教一事，在苏格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导致了苏格兰的全面起义。这场斗争，实质上是苏格兰贵族和资产阶级保卫自己的政治独立，反对推行英国国教所体现的专制制度的斗争。

1639年，查理一世以巨大代价募集了20,000军队进军苏格兰，结果不战而溃，查理一世被迫签订“停战协定书”。伦敦的资产阶级悬灯结彩，热烈庆贺，他们一致认为，苏格兰人战胜查理一世，意味着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了对付国内这些反对派，查理一世决定重建一支军队，但在资财方面又无能为力，遂决定于1640年4月重新召集中断了11年的议会会议。国王企图利用英格兰人的民族感，打着防备苏格兰人入侵的幌子，要求议会为组建军队提供资助金。但是，事情的进展并非一厢情愿，正如一位议员所说的，“苏格兰入侵的危险，远不及残暴统治的危险可怕，况且，国王所描述的危险还在遥远的地方，而我所说的危险，就在眼前……”议员们对查理一世的惨败不仅感到高兴，而且认为，“国王在

苏格兰的事业越糟，议会的事业就越好”。5月5日，议会又被解散。

于是，英国同苏格兰重开战事，查理一世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维持这场战争。不久，苏格兰转入全面反攻，进军英格兰，并占领了北部两郡。

英国专制政府对苏格兰作战的失败，加速了革命形势在英国的成熟。以国王为首的封建贵族，在对外和对内政策上一筹莫展，财政上亦陷入严重的危机阶段，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感觉到了国内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的对立情绪日益增长。特别是，这一时期工商业状况急剧恶化，政府的垄断和租税政策的失败，资本外流以及大量清教徒工商业者迁往美洲，更加导致了国内生产的严重萎缩和大量的失业的现象出现。

城乡各界人士对国王的不满和敌对情绪有增无减，因此，不断爆发示威游行甚至发生暴动和起义。国内的政治气氛显然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爆发一场更大的事件的可能性似乎马上就要变为现实。查理一世别无出路，只好再次求助于议会。

新的议会于1640年11月3日在韦斯敏斯特寺召开，一直到1653年春，历时13载而未曾解散。历史上通称这一届议会为“长期议会”。

新议会的召开和选举，对1640年秋季英国形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局势具有重大意义。在议会里，本来就有许多反对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值此专制制度危机四伏，广大人民采取果断行动的时机，议会自然而然成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中心。在议会活动的第一阶段，甚至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统

帅机关，这也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之一。

议会有三项议事日程：一、惩办国王的主要顾问——专横和暴力政策的怂恿者；二、使今后不再实行上述政策；三、按照清教徒的要求，把宗教政策贯彻到底。议会在达成前二项日程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它迅速而惊人地取缔了一系列封建专制制度的机构，诸如：星室法庭被撤消，最高法庭停止了工作，等等。尤其是1641年5月10日，国王被迫签署了“议会除非自己决议而不得解散”的法律，这样，专制制度的基础被彻底摧垮了。

议会依靠了人民的支持，首先是伦敦的平民群众——帮工、学徒、小手工业者、港口工人和水手，才取得这一切成就。议员们心中清楚，革命的一切成果都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增长才取得的。因此，一部分议员小心谨慎，不轻易得罪于人民，而另一部分议员的态度则发生急转直下，反对进一步的革命改造，反对解放下层人民群众。尤其是在宗教政策问题——即前面所说的议会的第三项议事日程上，议员之间出现了分歧和裂痕。

事情并没有结束。1641年11月，议会拟定了一份“大抗议书”，以204条、款、项，详细罗列了国王在专制统治时期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以及其它方面的问题。议员们围绕是否通过“大抗议书”发生了争议，再次暴露了议员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查理一世充分利用了议会的这个弱点，准备解散议会并镇压议会领袖，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不得不向人民群众发出呼吁。

1641年11月至12月间，伦敦和附近各郡的下层群众的骚动一直特别活跃，群众经常发起示威游行甚至武装行动。对此，

上层社会一些人提议，动用武力实行镇压，而议员皮姆却作了意味深远的答复：万万不可用任何手段削弱人民群众的锐气。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其生死存亡的关头，总是在人民中间寻找支柱和保护。

1642年1月3日，王室检查官要求以叛国罪名逮捕5名议员，其中包括皮姆。议会拒绝引渡。第二天，国王不顾古老习俗，亲自带兵去议会逮捕议员，但后者闻讯及时躲藏起来了。查理一世在途中，遇到许多准备用武力捍卫议会的人民群众。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人民群众是议会真正强有力的靠山。

伦敦的局势日趋紧张。市民们武装起来了。地处遥远的各郡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赶到伦敦进行声援。

1642年1月10日，查理一世由伦敦逃往北方，企图去外地征募军队。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难以避免了。

此时的英格兰，分为两个阵营——国王阵营和议会阵营。两个阵营都在分别集结力量。国王决定，收回过去违心所作的种种让步，而议会则因为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要求它采取坚决的行动，已经不能够和国王作任何妥协了。

1642年8月22日，国王在诺庭汉升起战旗，正式对议会宣战。

1642年9月，议会成立了一支24000人的军队，另外，还有沃里克和费尔法克斯指挥的20000多人。

内战刚开始时，议会军队占有许多优势：所有比较重要的海港都掌握在手中，因而能够控制海上交通；由于占据着伦敦，所以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比国王要充足得多。

但是，不可否认，国王军队的骑兵部队比较强悍，成员主要是由自幼惯于骑马和玩弄兵器的贵族组成。国王军队的步兵

部队里，有许多以前参加过大陆战争的士兵，还有一些则是各地封建主带来的仆从，他们以前曾经是雇佣的猎人和护林人，因此，都善于使用武器。

第一次内战（1642——1646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642年至1644年夏，军事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国王军队手中，而议会军队主要处于防御地位；第二阶段从1644年夏至1646年，军事主动权完全转到议会军队一方。

两军第一次大规模交战，发生在1642年10月23日，地点是在沃尔威克郡的埃克山附近，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此次交战，已经明显看出国王军队的骑兵部队占有极大优势，同时，暴露出议会军队战斗力太差，因为议会军队的成员都是雇佣兵员，只要给钱，替谁打仗都行，——否则，议会军队完全有可能给予国王军队以歼灭性打击。

1643年春，国王的三支部队开始进军伦敦，由于各部队之间没能密切协同，军纪又松松散散，加上北路军和西路军也不愿在自己的郡外作战，因此，国王军队没有能够夺取伦敦。虽然伦敦避免了严重威胁，但局势却依然持续紧张。

夏季到来了，议会军队仍然处于被动的态势。议会军队在艾塞克斯率领下向国王军队驻地牛津推进时，恰逢瘟疫流行，大量官兵借机潜逃，眼看着为数不多的部队大量减员，而此时查理一世的兵力却不断增加。

7月，英国的第二大港——布里斯托尔投降了国王军队，后者迅速占领了布里斯托尔，并进军约克郡，打败了费尔法克斯率领的议会军队，接着，开始围攻格洛斯特。

1643年秋，国王计划集中兵力，从三个方向攻击伦敦。具体部署是：纽卡斯尔公爵所属部队从北面进攻，康华里斯的部

队从西面进攻，中路的攻势行动由国王的侄子鲁波特亲王率部前往。此时，议会军队面临危机重重的严峻局面。

到了1643年底，国王军队进展神速，已经占领了英格兰五分之三的土地。

正当议会军队处于四面楚歌之际，还是人民的力量，阻止了国王军队的顺利发展，为议会军队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伦敦平民组成的伦敦民军，高速行军进抵国王军队围困的格洛斯特城下，以解该城之危。与此同时，由克伦威尔率领的自由农骑兵不仅打退了国王军队入侵东部的威胁，并且适时转入攻势，在温斯比附近一役获得了重大胜利。

1644年夏，内战已经发展到了第二阶段。7月2日，两军在约克附近的马斯顿战役中，由于议会军队将领克伦威尔的军事指挥天才和他所率领的“铁骑”的英勇顽强，使议会军队再次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俘获国王军队大批战俘和战争物资。

长期的内战加剧了人民的灾难，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议会只有早日结束战争，才能顺应潮流，取得人民的同情，而结束战争并非靠一句空话，一纸空文所能决定，决定命运的办法只能是迅速战胜国王军队。依靠目前议会所维持的这支部队，实在担负不了如此重大的历史任务，于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促使议会通过了彻底改组军队的决议，决定取消地方民军和雇佣军部队，建立一支统一的、正规的“新模范军”。这支军队全部由议会所属各郡征集的志愿兵组成，由国家预算来供养，并由议会集中统一指挥。

新军的统帅为33岁的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充任副统帅兼骑兵指挥。新军的中级指挥员也进行了大规模更新，其中许多将领原是很普通的平民：马车夫、修鞋匠以及修锅匠等等。新

军总兵力为二万二千人，其中包括七千六百人的骑兵和龙骑兵。这是一支新型的、正规的、纪律严明的军队，它的诞生，预示了内战终将以议会军队的胜利而告结束。

1645年4、5月间，新军进行了编组。其步兵分为十二个团，每个团辖十个连，平均每个连为一百二十人，其中有七十八名火枪兵和四十二名长矛兵。骑兵总数七千六百人中有一千六百名骑兵和一千名龙骑兵（即乘马持火枪作战的步兵）。所有骑兵编为十一个团，每团辖六个队，每队一百人，使用的兵器为刀、剑和手枪。龙骑兵只编有一个团，共十个连，每连为一百人，使用的兵器为火枪。

以往一直被忽视的炮兵部队，现在也重新整顿。全军火炮总数增加到五十六门。

正当新军进行整编、改组之际，国王查理一世正在牛津。

4月20日，克伦威尔奉命突然开进到牛津以西，阻止查理一世与其部将鲁普特的会师。克伦威尔所部经过连续七天的作战，拿下了几个国王军队占据的据点。议会军队的突然袭击，使国王军队损失了大量军马，因而军队的机动成了问题，而且由于缺少军马，其炮兵部队也只能裹足不前。于是，查理一世急忙把鲁普特调到牛津。5月7日，国王在牛津召集作战会议，决定将其所属部队一万一千人分成两部分，命鲁普特往北，哥林向西，寻机与议会军决战。

此时，议会已经得知国王采取的军事行动，遂命令费尔法克斯率部继续前进，围攻牛津。对于牛津的被围，查理一世反而感到有利可图，因为牛津的防御工事比较稳固，短时间内不宜攻取，所以，对于议会军队屯兵坚城之下，查理一世认为其